

钱颖一 主编

比较译丛

现代自由贸易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著

Free Trade Today

Jagdish Bhagwati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现代自由贸易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著

雷薇/译 徐菁/校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自由贸易/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著;雷薇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3.4

书名原文: Free Trade Today

ISBN 7-80073-685-7

I. 现… II. ①贾… ②雷… III. 自由贸易—研究 IV. F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7635号

Free Trade Today

Copyright © by 200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2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现代自由贸易

XIANDAI ZIYOU MAOYI

著 者: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译 者: 雷 薇

责任编辑: 杨 松

责任监制: 朱 磊 王祖力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69千字

版 次: 200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3-2337

书 号: ISBN 7-80073-685-7/F · 487

定 价: 13.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E-mail: 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前言

1987年，我应邀前往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做第一次“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学术演讲，随后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把这些演讲稿汇集成《贸易保护主义》一书出版。我的系列演讲受到了广泛关注，甚至还被翻译成数种语言。

10年后，我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再次发表了题为“当代自由贸易”的三篇演讲。20世纪90年代，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所面临的反对意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本人也参加了许多公开的辩论：既有面对面的，如1999年11月，我在西雅图的市政大厅里与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及其数以百计情绪激动的支持者们所进行的辩论（而恰逢此时在那里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一片混乱里无果而终）；还有在我被邀请前往世界各地发表演讲时，或是利用我在众多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为我

的观点与反对者们进行激烈的争论。但我的讲座还是在争论声中以录像带的形式出版了，而且我在大众媒体和其他地方发表的有关公众政策的文章也被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整理出版，书名为《一系列窗口：对贸易、移民和民主的不安》（1998）（*A Stream of Windows: Unsettling Reflections on Trade, Immigration, and Democracy*）和《百日风暴：论华盛顿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失策》（2001）（*The Wind of the Hundred Days: How Washington Mismanaged Globalization*）。

但目前的问题是，在贸易保护主义之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通过容易接受的、广泛的工作在短期内使自由贸易能够应对今天的怀疑和批评，真正使每一位公众在面临有关自由贸易的争论，以及做出谁对谁错的判断时，对自由贸易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广泛参与讨论对协商性民主是至关重要的，而协商性民主又是我们惟一值得拥有的民主。

同时，这也要求包括我在内的学者们承担起责任。我们必须站在科学的前沿，同时我们也必须参与政策的制定，并通过积极的参与来改善政策。而且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有关政策的

著作和讨论必须最好地反映我们所掌握的科学理论。我们所写的文章必须是建立在渊博学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应报纸编辑之邀花一个下午完成的一堆废话。

这也是我希望在一系列演讲中实现的目标。这些演讲使公众能够全面了解自由贸易理论在战后的发展，并描绘了变革自由贸易思维方式的关键性见解。这些见解体现了我自己的许多成果，其中许多是我在演讲时信口而谈的，但这也是必要的。因为正如著作一样，只要反映作者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的经济学理论。但我将这些理论见解以一种我希望的能体现象牙塔和外部世界之间创造性关系的方式融入到新旧政策问题之中。

任何学者和任何参与研究的知识分子都接受过别人的帮助。因此我必须承认，在40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从我的学生和朋友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数太多，所以无法一一列举。但在这里，我必须提到我的学生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罗伯特·芬斯特拉（Robert Feenstra）、理查德·布鲁切（Richard Brecher）、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s）、道格

拉斯·欧文 (Douglas Irwin)、马格努斯·布洛姆斯特伦 (Magnus Blomstrom)、伊莱亚斯·迪诺普洛斯 (Elias Dinopoulos)、卡尔·黄 (Karyiu Wong) 和维韦·德赫贾 (Vivek Dehejia), 以及我的朋友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Avinash Dixit)、埃尔赫南·赫尔普曼 (Elhanan Helpman)、罗伯特·鲍德温 (Robert Baldwin)、凯尔·巴格韦尔 (Kyle Bagwell)、罗伯特·施泰格 (Robert Staiger)、T. N. 斯里尼瓦桑 (T.N. Srinivasan)、阿萨尔·林德贝克 (Assar Lindbeck)、阿尔温德·帕纳卡雷亚 (Arvind Panagariya)、艾伦·迪尔多夫 (Alan Deardorff) 和罗伯特·斯特恩 (Robert Stern)。

我也从与拉尔夫·纳德和洛里·沃勒克 (Lori Wallach) 的争论中受益 (我用“受益”这个词绝不是讥讽那些我想感谢的人); 在与社会活动家, 特别是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普拉蒂普·梅赫塔 (Pradeep Mehta) 和马丁·霍尔 (Martin Khor) 等人一起工作和交谈中, 我也受益匪浅, 他们的观点经常被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所忽视。但正是这些人所提供的反对自由贸易的观点使我的文章的内涵更加丰富。

感谢奥里维亚·卡巴洛 (Olivia Carballo)、玛丽亚·科波拉 (Maria Coppola) 和比卡什·乔希 (Bikas Joshi) 所提供的秘书工作和对我研究的协助，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感谢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供的办公设施，也感谢《国际经济学》杂志的同事，高级雇员安德烈·梅耶 (Andre Meyer) 为我提供的舒适的工作环境；我还要特别感谢莱斯莉·盖尔布 (Leslie Gelb)、劳伦斯·科布 (Lawrence Korb) 以及西奥菲罗斯·热梅拉斯 (Theophilos Gemelas)；也感谢邀请我发表这些演讲的马格努斯·布洛姆斯特伦和阿萨尔·林德贝克。

目录

Contents

前言 V

第一章 1

面对自由贸易的传统威胁：战后商业政策的理论革命

第二章 33

“公平贸易”、收入分配和社会进程：用贸易理论迎接新的挑战

第三章 67

走向自由贸易：两种不同的态度和它们的理论依据

资本神话——商品和服务贸易与美元贸易的差异 93

作者简介 103

第一章 面对自由贸易的传统威胁： 战后商业政策的理论革命

- 为什么自由贸易理论不能令人信服
- 来自内部的传统反对意见：市场失灵或扭曲的主要作用
- 转向自由贸易：直接矫正国内市场扭曲
- 应对国外市场扭曲：用不同方式恢复自由贸易
- 直接非生产性逐利行为理论：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支持
- 自由贸易与经济增长

关于自由贸易的价值，亚当·斯密在他著名的《国富论》中提出并进行了阐述[但就像牛顿和莱布尼兹在微积分方面所做的贡献一样，我们必须承认阿贝·孔狄亚克(Abbé de Condillac)所做的卓越贡献，他的《商业和政府》与《国富论》同年出版，但在论述自由贸易方面却更加详细和深入]。¹自由贸易的基本理论已经提出两个多世纪了。贸易的收益来自于反映劳动分工的生产专业化。²亚当·斯密将他的论

1. 《商业和政府》现有一个很好的译本，是历史学家Shelagh Eltis 翻译的。参看Abbé de Condillac的《商业和政府》，Shelagh Eltis和Walter Eltis为该书做了序（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7）。有趣的是孔狄亚克也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家。

亚当·斯密和孔狄亚克迥然不同的风格让人想到了拿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做比较。亚当·斯密广博的学识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那发散思维的风格和作品中针对自由贸易乃至自由主义提出了几个具有“实际意义”的例外。这些可以在Jacob Viner的《亚当·斯密和自由主义》中看到。这一文章也被收录在他的《经济学知识史》（Douglas Irwin编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

2. 1964年，自从我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在《经济学》（第74期，第1—26页）上发表后，我一直认为，如果不以标准的方法来理解李嘉图的分析而仅以竞争优势理论来解释贸易模式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读过李嘉图的早期著作，就可以看到，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在静态研究下所采取的方法步骤时，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往往采用的是一个更为复杂和全面的模型。当然，即使到了现在，这也是众多贸易经济学家分析问题的主要方法。

述建立在这一论点之上，使其理论有了一个正确的基础。然而，最终还是大卫·李嘉图〔建立在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基础之上〕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这一课题。他用一个简易的模型：即只有一种生产要素，生产两种商品，而且劳动生产率不变，但两种商品的相对生产率存在国别差异——说明了通过专业化生产，参加贸易的两国都可以受益。李嘉图学派的分析说明了，只要自由贸易在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中进行，并且让价格决定资源的分配，那么通过贸易获益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现代经济学家强调的是贸易的收益，而20世纪理论学者们的工作就是努力为其寻找令人信服的证据。³

为什么自由贸易理论不能令人信服

如果说斯密—李嘉图对专业化生产为贸易带来好处的论述是具有启发性和说服力的（在那个年代甚至具有很强的科学说服力），事实上关于自由贸易的相关论述在《国富论》出版后便赢得了几乎每代经济学家极大的认同，但事实告诉我们，它在广大民众中却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这是为什么呢？

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贸易可以带来更大利益的论断与人们的直觉不相符。当数学家斯坦尼斯瓦夫·乌拉姆（Stanislaw Ulam）

3. 特别地，在1939年Paul Samuelson完成了早期的研究工作以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便与Murray Kemp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以静态分析论证了相对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自由贸易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参看Paul Samuelson的《再论国际贸易的收益》（《经济日报》第72期，1962年，第820—829页）和Murray Kemp的《国际贸易的收益》（《经济学》第72期，1972年，第803—819页）。

Jean Michel Grandmont和Daniel McFadden 在《传统贸易收益的技术注解》（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第2期，1972年，第109—125页）一文中对贸易静态收益做出了充分的证明。在当时自由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归功于以下几位作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是Torsten Persson、Alan Stockman、Avinash Dixit和Paul Samuelson。有关贸易、经济增长和福利问题的文章中我将陆续地提到。

(著名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的兄弟)问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什么样的陈述最违背直觉却又最具有说服力时,萨缪尔森的回答是比较优势理论。换句话说,就是自由贸易的优先理论。大多数人凭直觉认为一个人应当做他比别人做得更好的事,而没有必要专业化。他们只看到了因自由贸易失去的工作,却忽视了贸易可能为他们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这种行为反应了实验心理分析学家所说的人们在面临变化时的反应。

然而现在,自由贸易成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年轻人攻击的目标,对于这种现象我倾向于称之为“失去选择的专治”。在全球范围内,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共产主义的低落,以及由福山(Fukuyama)倡导的市场及资本主义必胜思潮的兴起,‘共同造就了理想主义年轻人的极端抵触,这些年轻人确信资本主义是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可以防止产生特权阶级,以及为很多人带来经济机会。我怀疑他们中有多少人知道撒切尔夫人只是一个小商店老板的女儿,尽管她也有过失误,但在她作为保守党领袖以来,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凭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凭借拥有BBC式的发音或顶着世袭的头衔(指凭借出身)而走向成功的。他们没有看到,在一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例如印度,人们想用配额代替市场,结果反而更糟,不平等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配额意味着有关系、有钱的人可以得到升迁,而市场则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机会。’认为市场和资本主义与社会的不平等有必然联系是一种很浅薄的看

4. 参看Francis Fukuyama的《最后一人》(New York:Free Press, 1990)。

5. 这个矛盾的结论是我和Padma Desai在《印度:工业化设想》(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0年)一书中得出的,当时,我们正在Ian Little、Tibor Scitovsky和Maurice Scott的领导下搞一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从事贸易和工业化政策研究的实证分析家也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法。这种看法使得一些人反对自由贸易及其主要倡导者——世贸组织。

在大西洋两岸的英语国家中，有许多文学、社会学的大学生被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后结构解构主义所迷惑。因为这种观点认为“意义是无尽的”，它使这些学生中很多人没有了判断的标准。正如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编年史学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很明显，德里达不只是一要发展读书的新技能，对他来说，解构主义是一种最终的政治实践，是一种以特定思维体系对逻辑进行拆解的尝试，整个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体系在背后支撑着它。通过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德里达的方法为犬儒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人们信念和行为的统治留下了一片政治空间。”⁶这便造成了一种矛盾：充满智慧的理论被无知的人所利用，其中包括了对经济学家及其专家意见的不信任甚至是敌视。

利用三件事可以对我的观点做更好的说明。洛里·沃勒克（Lori Wallach）是西雅图抗议的策划者，也是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在贸易方面主要的助手，她在华盛顿 Smithsonian 学院与我进行的一次辩论中说我在贸易方面的意见比起她所组织的抗议而言，并不能引起关贸总协定与世贸组织更多的注意。

我还必须提到西尔维亚·纳萨（Sylvia Nasar），她以前是《纽约时报》的经济记者。有一次她告诉我，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学生对她说“巴格瓦蒂和工会一样代表着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也只不过是自由贸易和关贸总协定的一个说客”。简而言之，虽然我们这些经济学家被称做是专家学者，但我们真正服务的对象却是那些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中被解构了的个人和

6. Terry Eagleton, 《文学理论简介》(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148)。

利益集团。

我又想起了那件有趣的事。越战期间，海德堡态度强硬的学生们声称，专家的见解是民主的敌人。他们希望老师在教他们的时候，知道的和他们一样多，这样在探寻知识的道路上才能做到真正的平等。我真后悔没有采纳他们的英明建议，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我根本用不着自讨苦吃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我完全可以成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像我有的同事一样（当然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也完全不去理会要不要对海德堡学说做点贡献。

但我还要说，自由贸易在公共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来自于人们的忽视，因为我们很少有人为了维护自由贸易而去据理力争。面对人们对自由贸易的批评，经济学家们最终表现出的是熟视无睹和漠不关心。他们不愿意在公众面前为贸易辩解，以避免成为批评的焦点。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拉尔夫·纳德在康奈尔大学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辩论是在晚上进行的，于是我利用下午时间，与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们对自由贸易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快结束时，我问学生们有多少人想跟我一起参加辩论，结果没有人举手。我问他们原因，典型的答案是他们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结果，一千多在场的学生中大多数是反对自由贸易的。他们都支持纳德。我努力让自己表现得不错。但我必须承认，那些对自由贸易误导性的批评，除非我们勇敢地去面对，否则，公共政策的舞台就会被自由贸易的反对者占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并不能完全责怪政客们去听从甚至参与对自由贸易的批评。

时刻维护自由贸易理论（事实上也包括很多其他的经济学术成果）的科学论断是我们的义务，我也是这样不知疲倦地教导我的学生的，他们不应该一味效仿自己的老师，还应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我的学生中我想提一下保罗·克鲁格曼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很不错的学生)和古拉斯·欧文(Gouglass Irwin)(我在哥伦比亚的一个极有天赋的学生),⁷以及他们出色的文章。拉塞尔·克劳(Russell Growe)在影片《角斗士》中有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听从他的调遣,我却没有,而这恰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西雅图,我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女示威者,她挡住了我的去路并以暴力相威胁企图迫使我放弃自己的主张。我的好朋友加里·桑普森(Gary Sampson)(一个出色的贸易经济学家,曾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任职)拉开了我,从而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他对我说:“如今你是自由贸易的主要旗手,我们不能失去你。”这件事看起来很有趣,并且事实上它的确很有趣。但从另一个侧面它反应了一个事实:我们中并没有多少人在为自由贸易而战。我们需要改变这一现状。

在此,如果我不指出归类法的谬误,那便是我的失职。该谬论将如今大部分老百姓对自由贸易的越来越不信任毫无逻辑地归因于最近世界范围内爆发的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一些很难揣摩的理由,反全球化的煽动者们认为全球化有点像概念或现象上的某种巨斑,这个巨斑上的每一个元素都会相互映衬。如果你支持自由贸易,你也必定支持短期资金的自由流动,支持自由的外国直接投资,支持自由的移民,自由恋爱,以至于

7. 在与我合作著书的朋友当中,经常写到自由贸易政策的有马里兰的Arvind Panagariya,耶鲁的T.N. Srinivasan,哈佛肯尼迪学院的Dani Rodrik,威斯康星的Robert Baldwin。这些都是世界级的贸易经济学家。在2000年末西雅图事件之后,我和其他一些国际贸易经济学家都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由各个大学贸易经济学学者组成的组织,坚定信仰,统一认识,为当今重要政策的制定提出我们的见解。这样的组织现已在密歇根大学建立起来(ACIT:由杰出的贸易经济学家Robert Stern 和Alan Deardorff领导的国际贸易学术联盟)。这个组织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发表了一封给美国各大院校校长的公开信,内容是关于校园激进主义者提出的一些建议,他们反对向这些学术机构提供服装的服饰商店,而这些校长们经常不加考虑就屈从于煽动者的要求。